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系列学术文集

先秦考古探微

王立新 著



科学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系列学术文集

先秦考古探微

王立新 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作者关于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与夏商周时期考古的专题论文集，共计收录论文33篇，包括“新石器时代考古”“夏代考古”“商代考古”“周代考古”“青铜时代考古综合”“理论与方法”六个专题。主要研究内容涉及两个方面，一是中国中原地区龙山至商代考古学文化的编年谱系、变迁过程与发展动因研究，一是北方长城地带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的文化与社会进程研究及早期游牧文化的形成机制研究。

本书供考古学、历史学及相关领域研究者与高校相关专业的师生阅读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先秦考古探微 / 王立新著.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6.12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系列学术文集)

ISBN 978-7-03-052651-9

I. ①先… II. ①王… III. ①考古-中国-先秦时代-文集 IV. ①K871.41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92732号

责任编辑: 王琳玮 / 责任校对: 邹慧卿

责任印制: 肖 兴 / 封面设计: 陈 敬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6年12月第 一 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6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29

字数: 690 000

定价: 18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序

王立新把他的论文集初稿给我看，要我写一个序。我便有幸细读了一遍，感到受益匪浅！

我记得，在他做张忠培先生的硕士研究生时，正是类型学研究在吉林大学十分盛行之时。他曾把他的硕士论文《单把鬲谱系研究》初稿给我看，给我留下挺深的印象。我觉得，他的思维相当严密：先把单把鬲、单把鬲式鬲和单把鬲弄清楚，再把单把鬲和单把鬲式鬲的总体形态细致分为领口、三空足、腹腔三个部分，分别研究它们形式上的变化序列，进而找到同步演变的趋势。从而把单把鬲和单把鬲式鬲统一分为甲、乙两大类，分别排出各自的演变序列，使人感到很有说服力。这和当时不少研究生只是机械地把器物排列成表面上看来是循序渐变的系列，在思路 and 眼光上都显然有别。他的这种细致而周密/types学方法，在他的博士论文《早商文化研究》分析早商陶器和青铜器的形态演变序列时也清楚地表现出来。再后来，在他指导张礼艳的博士论文关于西周陶器形态演变序列部分，即《丰镐地区西周墓葬分期研究》（载于《考古学报》2012年第1期）中，也突出地表现出来。

我觉得，当初蒙德留斯建立独立于地层学的类型学相对年代研究方法，其思路并非仅依赖遗物外在形态的循序演变系列〔滕固：《先史考古学方法论》译为“联类”（Serie）〕，他特别强调要以最审慎的态度去研究发现物的互相关系，要用是否有平行排列的演变系列来验证所排系列是否正确。苏秉琦先生把蒙德留斯的方法应用于中国考古学研究，在斗鸡台和中州路两批资料中主要是使用的不同遗物的演变系列是否有平行（或“同步”）现象的方法。而同一种遗物本身不同部分的演变是否有平行（或“同步”）现象，在邹衡、严文明两位先生的研究中有较大的发展。王立新的单把鬲研究和早商陶器研究都可以作为细致研究同一遗物各方面特征是否有同步的演变系列的可借鉴的范例。

王立新在做我的博士生时，有两件事我很称赞。一个是他作为考古的博士生，对我讲的古文字学和先秦文献的课学得很起劲。记得他还和我的另位攻读古文字学的博士生合写过一篇考证西周金文中有关车马器的论文。而他在攻博期间写《桐宫再考》文章时（我只是提供了《史记》说伊尹放太甲于“桐宫”的“宫”是司马迁加上去的这样一个想法），查了很多历史地理方面的文献，都是他自己独立查到的。他自己说，既然当了林老师的研究生，那么林老师所长一定也要学。现在看他的论文集，不但有多处是运用先秦文献、古文字资料和考古学材料相结合来讨论问题的，说明他

毕业后还在这些方面继续下功夫，而且为了扩大研究面，还继续学习了地质学、古环境学、文化人类学、科技考古等方面的著作，知识面已经比我更广了。而使我感动的是，我的学生后来大都只关心自己所从事的学术方向，对我的各个方面的研究进展多不甚了了，而王立新则一直关心我发表了哪些新的论文，能相当全面地介绍我的研究成果。这是很不容易的。另一个是，我的学生有不少说很怕我（我自己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先想好见我要说什么，见了我就想不起来了。王立新不是这样，很有主见，常常和我辩论不止。我那时家里虽已有三室，一间住我母亲，一间住两个孩子，我的书房和寝室是一间，如果晚上王立新来了，一辩论起来，我爱人便不能睡觉了。但是我很喜欢这样的学生。后来我看到有些我很敬爱的前辈学者，到了晚年，因为周围有很多人无原则地捧着，便不能清醒对待自己，很怕自己也会这样，便嘱咐王立新，说我如果老到那样的程度，你可不要那样捧我，该辩的时候一定要辩，让我能保持一点清醒啊。

这次全面看了王立新的论文集，觉得有三点很值得称赞：

第一条，是研究的问题不限于一个方向，而在不同方向上都有重要的突破。

王立新在攻读硕士学位时是做新石器时代研究的，而到了博士生时就专攻商代考古了，后来接替我讲夏商周考古，所以在夏商考古方面都有钻研，他的博士论文《早商文化研究》在早商文化的分布过程及其动因的研究上取得重要突破，入选“高校文科博士文库”（每年在人文社会科学博士论文中仅选10篇）。《从嵩山南北的文化整合看夏王朝的出现》《下七垣文化探源》《试论下七垣文化的南下》《从早商城址看商王朝早期的都与直辖邑》等文，都是深入细致分析考古资料，结合文献记载，复原夏、商历史的重要力作。但吉林大学地处东北，又成立了“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因此他的田野工作集中在中国东北地区，先是在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田野工作和综合研究方面取得了领先的成果，不仅在分期和分区上超过前人，而且在该文化的来源、社会形态、社会发展阶段、经济形态等方面都有新的认识。继而在林西井沟子发掘了首批可以明确定为东胡的墓葬、在克什克腾旗喜鹊沟发掘了早到商代的铜锡砷共生矿，进而在白城双塔遗址发现了距今万年前后的陶器，都是东北考古的重大突破。

除此之外，他也对长城地带从东到西的周代考古资料做了全面的综合研究，并提出了不能机械地看待气候变化和经济类型改变的关系、长城地带并非一下子全盘游牧化等重要观点。

第二条，他多年的考古研究始终没有脱离田野考古的实践。

比如，他在东北考古上的重要突破，都是在他亲自参加发掘的遗址或墓地的研究中所获得的，而且多数发掘的地点是他和考古同行或带领学生多次调查才选定的。而他对中原地区夏商考古的资料虽不能亲自参加发掘，但利用各种机会进行实地考察并认真观摩发掘品，一直是他醉心的事情。因此，他在考古学研究上取得的丰富成果，是和他始终不脱离田野考古、尽可能贴近考古第一线分不开的。

第三条，他是考古工作者中爱思考又善于思考的一员。

我觉得，他在开始时是在地层学和类型学上很下功夫的，但在反复实践中又不断探索正在发展的新的考古学研究方法。这些想法在《浅论考古资料系统化与解释研究的方法》和《大安后套木嘎遗址发掘方法、技术与记录手段的新尝试》中较集中的反映出来，表现出决不故步自封而不断开拓进取的精神。

纵观他的全部论文，有相当大的部分已经是研究古代的社会演进过程，影响社会进程的动力，以及经济形态的改变和气候变化的关系等问题。要研究这些问题，特别需要综合多方面的考古资料，而且不限于考古资料，进行深入的思考，才能有所创获。

以对红山文化的社会发展阶段研究为例，他就没有像不少研究者那样，附和苏秉琦先生的“古国”“原生型国家”说，而是从红山文化遗址的地面调查材料，结合个别的发掘成果，分析出红山文化已经出现了中心居落和一般居落构成的聚落群，而若干个聚落群又构成地跨数百平方千米的遗址群体，比较令人信服地说明了当时已存在部落联合体，从而证明牛河梁是刻意选址、严密规划、规模宏大的坛、庙、冢一体的遗址群，无疑反映了超部落的社会组织的存在。另外，他用女神崇拜（按：因所谓“女神庙”并未全面发掘，此点尚应存疑）、各积石冢中心大墓分属不同族团故不同宗、尚无迹象表明有唯一的王者、神庙为中心的布局表明了神权的至上等，论证红山文化的社会形态应该和早期国家尚有一定距离，而且从伦福儒、厄勒对酋邦社会的最新研究结果推定红山文化的社会是“一种以团体为本位的复杂酋邦社会”，就颇足以自成一家之言。比如，他从红山文化的聚落群分布的密度，远者10余千米，近者只有2~3千米，说明当时可供垦用的土地已不富余，来说明红山文化这种粗放式的、较高强度的农业活动一旦和气候干冷化耦合，必然导致社会的突然衰落，这也是很有说服力的。又比如，过去对于长城地带经济形态的游牧化，是简单的推想因为气候的干冷化，从朱开沟文化开始畜牧业的比重就逐渐增加，进而演变为游牧的。我在《夏至战国中国北方长城地带游牧文化带的形成过程》中反对这种见解，但也是简单化地认为是北方游牧人群南下所致。

他在《试论长城地带中段青铜时代文化的发展》一文中，根据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比较细致地论证了重新界定的朱开沟文化并无畜牧业逐渐增加的迹象，其后的西岔文化和李家崖文化的经济形态也仍是以农业为主。气候干冷化只是造成了中段的北部地区人烟稀少，而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出现了多人种、多文化传统和不同经济形态的人群在此地杂居的局面。而该地区发达的游牧业的兴起，北来人群的作用尤为重要，使该地区游牧化的实际历史呈现出来了，并由此提出，经济形态的转变不能只考虑环境的制约作用，也应充分注意战争及人群的迁徙等人为因素的作用，这样才有更大的说服力。

他的论文中也有一部分是属于中国考古学中传统的考古学文化界定和文化因素分析的。但因为他把这种研究和文献记载相结合，就在复原历史方面给人以新的启示。

例如，他在研究二里头文化的形成时，仔细区别了嵩山以北的郑洛区和以南的汝颖区在陶器器形、外来成分的构成和出现频率上的差别，明确地分为两种不同的考古学文化——王湾三期文化和煤山文化。进而又较生动地描绘了在龙山末期，煤山文化因素沿嵩山东侧北上，经郑州地区而进入王湾三期文化腹地的图景。改变了过去很多学者认为是嵩山南北的龙山文化经过新砦期发展到二里头文化的单线渐进观，把新砦期变成了煤山文化和王湾三期文化相互碰撞、整合的过程，且认为整合过程中煤山文化扮演着更主动、更重要的角色。在和文献结合方面，他不同意李伯谦先生所说二里头文化的形成是“后羿代夏”的结果，而把煤山文化的北上和夏启代益后，征伐观、扈等部族联系起来，把二里头文化形成作为启成为“天下咸朝”的联盟主的结果。随之，又提出了在此之前不可能有所谓的“早期夏文化”，以及二里头文化作为“夏文化”已经是一种“国族文化”这样的有新颖理论意义的见解，可供考古界同仁展开热烈讨论。

以上只是举例说明王立新在研究问题时爱思索又善于思索，相信读者在读他的其他论文时一定也会自己体察到这一点的。我想：爱思索是出于他对考古的热忱，所以能钻进去，抓住问题不放手；善于思索则是建立在他不断吸收考古新发现、新研究成果，以及考古学之外的多方面知识的坚实基础之上的。

读完这部论文集之后，有两个想法：一个是，中国考古学需要有更多像王立新这样能不局限于一个研究方向、始终不脱离田野实践、又爱思索并善于思索的工作者，如果有了他们，就一定能使中国考古学发展得更快更好，矗立于世界考古之林；另一个是，我们中国的学术界现在还很少有对前辈学者的观点大胆提出不同意见的论著，希望这部论文集问世之后，不要再是一味的称赞，而能引起一点研讨论辩之风。那是将会对考古学的发展大有好处的。

林 沅

2017年1月1日于长春

目 录

序·····	林 沅 (i)
--------	---------

新石器时代考古

辽西区史前社会的复杂化进程·····	(3)
中国东北地区发现万年前后陶器——吉林白城双塔遗址一期遗存的发现与初步认识·····	(17)
试论红山文化的社会性质·····	(26)
瑶山祭坛及良渚文化神徽含义的初步解释·····	(37)
单把鬲谱系研究·····	(45)
关于“龙山时代”的概念·····	(75)

夏代考古

从嵩山南北的文化整合看夏王朝的出现·····	(83)
下七垣文化探源·····	(101)
试论下七垣文化的南下·····	(113)
夏家店下层文化渊源刍论·····	(129)
关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几个问题·····	(146)
大山前遗址发掘资料所反映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经济形态与环境背景·····	(162)
试析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的类型与布局特点·····	(170)
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非龙山化过程及骨卜习俗的先进性·····	(178)
夏家店下层文化综论·····	(182)

商代考古

试论早商文化的分布过程·····	(207)
从早商城址看商王朝早期的都与直辖邑·····	(233)
“桐宫”再考·····	(257)
论克什克腾旗喜鹊沟铜矿遗址及相关问题·····	(263)
试析商代方国都邑与商王朝军事重镇的异同——以三星堆和吴城城址为例·····	(274)

周代考古

关于天马—曲村遗址性质的几个问题·····	(283)
龙头山遗址的几个问题·····	(291)
探寻东胡遗存的一个新线索·····	(302)
秦统一前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的文化多元化及其历史背景·····	(314)

青铜时代考古综合

试论长城地带中段青铜时代文化的发展·····	(347)
辽西区夏至战国时期文化格局与经济形态的演进·····	(368)
中国东北地区所见的珍珠纹陶器·····	(398)
也谈“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的根由·····	(411)

理论与方法

也谈文化形成的滞后性——以早商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形成为例·····	(421)
关于文明探源研究的一点思考·····	(432)
浅论考古资料系统化与解释研究的方法·····	(435)
大安后套木嘎遗址发掘方法、技术与记录手段的新尝试·····	(444)
灰坑发掘中应当注意的三种情况·····	(453)
后记·····	(455)

新石器时代考古

辽西区史前社会的复杂化进程

本文所说的辽西区，是考古学上文化区的概念。早在1977年，张忠培先生在为吉林大学考古专业学生讲授东北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时，就明确提出战国以前的辽西区可以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考古学文化区。1991年，张先生在《辽宁古遗存的分区、编年及其他》一文中，进一步对该区的地理范围进行了界定。他指出，该区“是指医巫闾山以西，北至西拉木伦河两侧，包括西拉木伦河、老哈河、大凌河、小凌河及它们的支流地区”^[1]。

就目前认识，这一区域内已确认的史前文化主要是新石器时代中后期的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和小河沿文化。它们应当属于前后相继的单一文化序列^[2]。从文化内涵上看，这四支文化相互之间的一些主要文化成分具有明显的传承关系。因而，从文化谱系上说，它们大体应属同一系统的考古学文化。

自兴隆洼文化至小河沿文化，作为一个单一文化迭相更替且文化传统连绵不断的考古文化区，辽西区的古代社会究竟经历了什么样的演进过程？导致或影响这一社会进程的动力是什么？这些都是东北史前考古中需要着力解决的重大课题。

近年，辽西区一系列史前遗址的大规模发掘和区域性考古调查的蓬勃开展，以及多学科分析手段在实际工作中的运用，都为上述问题的解答积累了颇为丰富的资料。本文即拟在综合分析以往考古发现和研究认识的基础上，对辽西区史前社会的复杂化进程做一尝试性探索。



兴隆洼文化的年代据¹⁴C测定，在公元前6200~前5400年^[3]。这一时期聚落内部的布局大体有两种。

第一种以敖汉兴隆洼^[4]、克什克腾南台子^[5]和阜新查海^[6]聚落为代表。特点是几乎所有居住性遗迹皆相互毗连，集中在地形起伏不大的同一区域之内。从分期的角度看，处于兴隆洼文化偏早阶段的南台子和兴隆洼一期聚落，居住区外都有椭圆形的围沟。沟内房屋皆成排分布、整齐划一，体现了建筑过程中的统一规划和设计。南台子聚落共发现房址33座，最大的一间房子位于居住区中心偏北。兴隆洼一期聚落所包含的房屋数尚不确定，但规模可以肯定要大于南台子聚落，这里最大的两间房屋并排

坐落于居住区的中心部位，面积各达140多平方米。这两处聚落都呈现了一种以大房子为中心的凝聚式布局。按照以往对仰韶聚落的分析，似可推测这两处聚落各自代表了一个以血缘关系相维系的氏族公社。需加说明的是，两聚落的围沟既窄且浅，宽、深均仅1米上下，与后来的城壕不可同日而语。所以，与其说它们是一种公共的防御性设施，倒不如说是一种界沟，借以强调整个聚落的统一精神。

查海三期聚落大体属兴隆洼文化的偏晚阶段。聚落内的房屋集结为若干个房屋组，每组2~4座，组内的房屋大多仍遵循着排列成行的习惯。而从整个聚落看房屋已不再有统一分排的现象。聚落内房屋由统一分排到出现若干房屋组，似乎意味着氏族内部血缘纽带的维系力开始减弱，而按血缘关系的亲疏程度进一步区分的“小集体”的地位正在逐渐得到重视。据介绍，兴隆洼聚落的偏晚阶段，亦出现了类似现象。可见，至少从兴隆洼文化晚期阶段开始，类似查海这样的聚落已可区分为聚落—房屋组—单个房屋的三级结构。综合各方面现象，可以认为以房屋组为代表的人群此时已成为村落中相对独立的经济单位。依组内房间的可居住空间判断，这种规模的人群少则七八人，多则十数人，很可能是包含三代人左右的一个大家庭，或称家族。单个房间虽然也都发现有灶，并常伴随日常的生产与生活用具出土，但从整个聚落内少见单个房屋独立成组的现象看，以单个房间为代表的人群在经济上未必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单位。尽管此时聚落内的人群已按血缘上的亲疏关系趋于分化并体现于房屋布局中，但就整个聚落来说，凝聚性却并未因此而丧失。在查海，在一个由若干房屋组所围绕的500平方米左右的场地内，发现处长19.2米的龙形堆石，其南侧又分布有10座墓葬和2座内存烧灰和猪骨的祭祀坑。这片遗迹的规模虽小，作用却有可能已类似于年代略晚的半坡文化村落中心的广场，属于整个村落举行公共性礼仪活动的重要场所^[7]。况且，此时这片居住区的外围仍有界沟的环绕。

在林西白音长汗^[8]和敖汉兴隆沟^[9]遗址，看到的则是兴隆洼文化聚落内部布局的另一种形式：聚落由彼此分开的2或3个区或地点组成。这些区由于彼此紧邻而仍可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白音长汗遗址属同一时期的聚落被分为南北两区，各自都有围沟标界。两区之间约有40米的开阔地带相隔。北区发现有房址29座，呈4排分布。南区规模与北区大体相若。两区相距甚近却以围沟严格界分，透露出彼此所居人群在血缘关系上的疏远。这大概代表了两个因联姻或其他需要结邻而居的氏族公社。兴隆沟聚落则可明确区分成东、中、西三区，彼此亦有空白地带相隔。如果说这里每区各能代表一个氏族公社的话，那么整个聚落的人群就很可能属于包括了三个氏族公社的高一级社会组织。这种组织的性质不大明确，或可称之为氏族联合体。由于白音长汗和兴隆沟聚落的年代大体都在兴隆洼文化的中期或稍晚阶段，因而，这种高于氏族公社一级的社会组织的出现时间，当不晚于兴隆洼文化的中期。

在近年中美赤峰联合考古队对赤峰西部地区所进行的区域性考古调查中,在765.4平方千米的范围内共发现兴隆洼文化的遗址14处^[10]。遗址点的分布稀疏且较为均匀。这些遗址点有的单独一处,有的则两三个在彼此相距很近的距离内结邻,相互之间只有几十米的空白地带或自然沟壑相隔,而整个范围的长度均不超过1千米,以至于各个地点的社团成员能够很容易地进行日常的面对面交流或从事共同的事业。这种“毗邻而居”的若干遗址点在以往我国学者所从事的调查中一般是作为同一个遗址来记录的。其中的各个地点则往往被视为遗址中的不同分区。前述白音长汗和兴隆沟遗址即是这样的情况。所以,若按我们传统上对遗址的判定标准,合并若干毗邻而居的“遗址点”之后,调查区内的兴隆洼文化遗址实际要少于14处。

结合已发掘的几处遗址看,兴隆洼文化的聚落在规模上虽有差异,所对应的社会组织在层次上又各有不同,但从空间分布和内部结构看,并未表现出中心聚落出现的任何迹象。

凡保存较好的兴隆洼文化的房址,内部多数只有日常生活必需的日用陶器和工具。房屋的形制、结构与陈设也都十分相似。个别房址在所处位置、规模或出土遗物上与其他房屋有所不同,如查海聚落中的F46,位于聚落北部居中位置,是聚落内最大的一座房址,面积约120平方米,房内出土了一对特大型石铲,较之一般石铲大一倍有余,刃部无使用痕迹。发掘者推测这可能是举行某种仪式的特殊用具,同时也是此屋主人地位的象征。又如白音长汗F19,该房址位置并不居中,规模也并非最大,多数出土物与其他房屋无甚区别,但室内居住面中央矗立一座石雕女神像,显示了此屋在功能上的特殊性^[11]。

兴隆洼文化的墓葬存在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将死者埋于室内,见于兴隆洼、兴隆沟与查海三地。第二种为中心广场墓葬,见于查海。第三种即一般墓葬,分布于居住区之外,见于兴隆洼、白音长汗和巴林右旗的锡本包楞^[12]等地点。前两种墓葬均有特殊性,埋葬的原因及墓主人的身份都不甚清楚。其中部分室内墓葬的死者随葬有玉玦、玉匕形器及蚌饰、牙饰等较精致的物品。兴隆洼M118居室墓葬主甚至与两头整猪同穴并列埋葬,可能反映了死者的身份地位与众不同^[13]。白音长汗聚落附近的坡顶上有一处小型墓地,居山顶中心部位的M5为长方形石板墓,地表有石砌围圈,其余墓皆土坑竖穴式,地表有积石。M5被盗,其余墓葬多见个人的小件装饰品,仅个别墓葬随葬有陶器。推测M5墓主人的地位可能要较其他诸墓为高。以上现象反映当时社会已有初步的阶层分化,但不同阶层在居住和埋葬待遇上的差距并不悬殊。所以,这一时期可视为古代社会正由较早阶段的平等社会向分层社会的过渡阶段。

此外,与白音长汗石雕女神像风格类似的实物还见于林西西门外^[14]等兴隆洼文化遗址。这说明女神崇拜已不是单个聚落中的偶然现象,可能已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一
二

赵宝沟文化的绝对年代在公元前5200~前4200年^[15]。该文化已开始接收到来自中原方面的影响,出现了一些比较精致的泥质陶器。

在赤峰西部的区域性调查中,共登记有含赵宝沟文化陶片的遗址29处,数量比兴隆洼文化多一倍。遗址点的分布相对比较均匀。这一时期仍旧有一些独立一处的遗址点,但几个遗址点相聚成群的现象较为多见。即使按毗邻而居即属同一聚落的原则合并了若干个遗址点之后,仍有2或3处遗址相聚成群的现象。群内的遗址相距近者约数百米,远者可达1千米以上。这种遗址群的出现,表明该时期社会组织结构的复杂性进一步加大。按照前文我们关于聚落遗址所对应的社会组织是氏族或氏族联合体的推论,这种遗址群所代表的显然应是更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如果和已知的人类学材料相对比,似可将这些由邻近聚落中的人群所构成的小范围的地域性社会组织,对应于部落这一层级。

赵宝沟文化的聚落规模不等,甚至同一聚落内不同居住地点的规模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敖汉赵宝沟聚落^[16]的面积约9万平方米,是目前所知该文化聚落中规模较大的一处,居住地可分两区,中间有浅凹地带相隔。从对第一区的发掘来看,聚落内部房屋的分布特点与兴隆洼文化偏晚阶段相似。往往2~4座房屋聚为一组,组内房屋多按同一方向排布。有时几组这样的房屋倒似沿坡岗上的同一等高线形成一排,但就整个聚落来说,已不存在统一分排的规律。在整个聚落中,房屋组才是最引人注目的单元。生活于其中的家族,构成了社区中相对独立的、恐怕也是最基本的经济单位。此时位居第一区中央的仍是一所大房子(F9),面积近100平方米。房屋倒塌堆积中出土有大量遗物,仅可供饮食的钵碗类器皿即有37件,占所清理的17座房屋出土全部饮食器的近三分之一。可见它不仅仅是一个家族日常起居之处,也当是赵宝沟聚落中一处重要的公共活动场所。除此大房子之外,聚落东部有一处以石块垒砌的圆角方形的平台状遗迹也颇为重要。发掘者推测,这可能是该聚落的一处公共的祭祀性建筑。大房子和石砌建筑的存在,标志着聚落的统一精神依然强固。

类似于赵宝沟聚落F9那样的大型房屋和居住区附近祭坛性质的石砌建筑,目前还不见于其他地点的报道。赵宝沟聚落是否已构成了附近一定范围之内的中心性聚落,限于对比资料的匮乏,尚不得而知。

缺乏墓地的揭露使得分析赵宝沟文化的阶层分化受到一定限制。不过,可反映社会分层的迹象在若干聚落中已有不同程度的体现。《敖汉赵宝沟》一书的作者依据房屋的规模、形制、建筑技术及出土遗物的差别将聚落内已清理的17座房屋分为由高及低的四个等级,以此来表现房屋主人身份地位的差异。不过,由于所分过细,各等级

之间的差别实际上非常微小。小山遗址F2是研究赵宝沟文化的学者们经常要提到的一处重要遗迹^[17]。该房址出土遗物在居住面上的分布,显示出房内已有男、女两性劳作空间的分割^[18]。出土于男性一侧的一件石钺,制作精巧无比,当是权力的象征;一件陶尊的腹部竟刻划有环绕器身的成组神秘化动物纹,可辨其形者有肋生双翅的鹿、躯体盘卷如蛇的猪和一只似鹰非鹰的怪鸟,图案之抽象,令人惊异。由此,足可窥见当时人们精神活动的复杂。类似的神鹿形象也见于赵宝沟和敖汉南台地^[19]聚落出土的陶尊之上,反映出对此类灵物形象的创作和表现,在较大的范围中已遵循着相同的程式。所以,拥有这种特殊陶器和石钺的房屋男主人毫无疑问地被认为是该聚落中首领级的人物。但须强调的是,与这些高级别遗物同出的毕竟还有石核和大量石片,这是制作石器的遗留。显然,这一“尊贵”的人物并未脱离普通的劳动。这一事实似乎表明,赵宝沟文化的聚落中虽有成员之间的等级地位之分,但更多的应是表现在祭祀或其他的礼仪活动方面,未必达到经济或政治地位不平等的地步。而且,较之社会关系更为复杂的等级社会来说,此时尚未达到全社会划分为若干不同阶层的程度。而這些,正是部落社会所具有的特质。

值得一提的是,在位于赵宝沟文化分布区边缘的滦平后台子遗址中,曾发现6件石质女性雕像^[20]。看来,女神崇拜仍然是这一区域中人们精神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

接下来的是红山文化。该文化的绝对年代可推定在公元前4200~前3000年。它与中原文化之间的联系,较之赵宝沟文化阶段要更为紧密。这一时期,遗址的分布密度陡增。前述赤峰西部的区域性调查共发现含红山文化陶片的遗址点160处,比赵宝沟文化阶段的遗址点数量多了数倍。按照周南(Robert D.Drenan)教授的看法,这160处遗址点实际上可归并为125个“村落”级的遗址,而其中大约半数的“村落”遗址在空间上可聚合为13个较大的群体。不仅如此,分布于调查区域东南部的其中6个群体,由于彼此相距较近,相互之间似乎又集结为一个更高层次的群体^[21]。

以往敖汉旗的文物普查也已揭示出了类似的现象。据邵国田先生介绍,该旗范围内红山文化遗址点的结群现象十分普遍。一般每群包含3~5个遗址点,多者可达20余个遗址点。而以河谷为纽带,若干遗址群又聚集成更高层次的群体。旗内大约可分出6个这样的群体。这种规模的群体所占据的地域面积均在数百平方千米以上,所包括的遗址群的数量多少不等。牐牛河上源的这种群体包括了11个遗址群,分布于大约700平方千米的流域范围内^[22]。其分布密度与在赤峰西部调查中所看到的情形大体相同。这种地跨数百平方千米的遗址群体的出现,较之赵宝沟文化阶段无疑是一个大大的进步。如果说聚落群这一小范围的地域性社团对应于部落一级的社会组织的话,那么,

这一时期占地更广的遗址群体的出现，或许表明若干地域邻近的部落已经以某种形式结合成了一种部落联合体。

敖汉旗的调查资料显示，这一时期的遗址已明确出现大、中、小三级结构，面积较小的遗址多为4000~5000平方米，中型遗址多在3万~10万平方米，而大型遗址面积可达2~3平方千米。一个遗址群往往由一个大型或中型遗址为中心，周围则是若干较小的遗址，表明遗址群中已出现中心聚落与从属性聚落的对立现象。

位于牐牛河上源丘陵山地中的西台遗址群，共包含12个遗址点。位居中心的西台遗址设有两个相连的围沟，平面恰好形成一个“凸”字形的轮廓。其中东南侧的围沟周长600多米，现宽约2米，最深处2.25米，具有一定的防御功能^[23]。这种设防的中心性聚落，或许已具备了后来方国都邑的某些功能。

巴林左旗友好村二道梁遗址是一个经较大规模发掘的普通性聚落^[24]。在3215平方米的发掘范围内共发现红山文化房址15座，灰坑171座。遗迹显得比较稀疏。房屋有的两三座聚为一组，有的则单独一处，分布上已无成行排列的现象。这一布局显示出家族一级的社会组织仍是稳定的经济单位，而有的家庭在经济上或许也具有了一定的独立性。这一变化可能表明氏族公有制经济成分有所削弱，而私有制经济成分正逐步得到强化。

已发现的红山文化墓葬大多以积石冢的形式出现。常见的墓地一般规模较小，多位于某一处遗址附近的山岗上。墓葬少则几座，多则数十座集中于一个相对狭小的区域内。结构形式与兴隆洼文化山岗墓地（如白音长汗）所见一脉相承。已知克什克腾旗南台子、林西白音长汗、阜新胡头沟^[25]、巴林右旗洪格力图^[26]等地点都有发现。据称，敖汉旗最南端的四家子镇也发现了3处积石冢墓地^[27]。上述墓地，大体都是就近选址，且与某一聚落存在对应关系的普通墓地。

地处辽宁建平与凌源交界处的牛河梁遗址群，是红山文化晚期的一处规模庞大的墓地群兼祭祀中心。已发现的20余处遗址点，集中分布于50平方千米的范围内。在已编号的16个地点中，有13个地点都有积石冢。这些积石冢分布于牛河梁一带绵延的丘岗之上。一般一岗一冢，也有一岗双冢和一岗多冢的情况，而每冢中墓葬数量多少不等，多者一冢可达数十座墓。每冢中央都有1或2座规模较大、地位显赫的墓葬。除积石冢外，另外的几个地点都是重要的祭祀场所。其中，位于牛河梁主梁顶部的女神庙及其北侧经人工修整的大型山台，显然是整个遗址群的重心所在。多年的工作和研究表明，牛河梁遗址群当初的建设，无疑是经过了严密的统筹规划和设计，从而将墓地群与几处重要的祭祀场所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并与周围的自然景观融为一体^[28]。调查发现，在这片墓地群与相关祭祀址所在的上百平方千米范围内，已不见任何世俗的居住性遗址。

种种迹象显示，牛河梁遗址群选址之刻意、规划之严密、规模之宏大、内涵之复杂已远非前述普通墓地可比拟。它并非某一部落、更非某一氏族所能拥有，至少应是